



马连良之死

□ 章诒和

爱看戏的首长们

父亲(章伯钧)爱看戏。父辈似乎都爱看戏。在这个爱好上,分辨不出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政治身份的差异来。难怪从前的艺人地位虽低下,但心理上却是自傲的:“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1949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

请您。”

1956年,禁戏内部演出。其间,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竟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

“我当然要来。”

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坐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对艺术精益求精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

无一日懈怠。在平日里,他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

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妆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都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合同。这在梨园行是首创。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有本事的人,谁不乐意?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便被马连良相中。杨宝贵改行操琴,张君秋崭露头角,袁世海浮出水面,也都即时签下合同。

强大的演员阵容,配以干净、整齐、清爽的台风,马连良的戏,真的是很好看。他演戏一丝不苟,极其认真,非常讲究舞台上的配合与谐调。一次,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是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天津万国桥。从此,他再也不演《八大锤》。

“赴朝慰问”风波

1953年10月,贺龙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



1963年马连良与琴师李慕良研究唱腔

志愿军。共有40个团,3000多个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参加。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尽在其内。很想投入新政权的马连良闻讯后,主动要求赴朝鲜慰问演出。齐燕铭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是马连良第一次出国,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

一天,他们在朝鲜战地的露天剧场演出。秋末黄昏来得总是很快,太阳早就落进了西山。裹着浓重凉意的山岚,渐渐地和夜色混和在一起。晚饭后,老舍和周信芳在营房外面散步,一阵胡琴声音清晰可辨。他俩寻声而去,操琴的竟是两个炊事兵,一个姓牟,一个姓王。短暂的宁静,熟悉的旋律与士兵的悠然,激发了他们在大自然怀抱里清歌的热情,也许他们今后一辈子再也遇不到这样的奇异场景和奇特感受了。

很快,临时组织了一个清唱晚会,由这两个部队炊事员操琴。马连良最积极,唱了两段,先唱《马鞍山》,后唱《三娘教子》。周信芳唱《四进士》,老舍唱《钓金龟》,高元钧说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最后是梅兰芳的《玉堂春》。听者,忘了自己是战士;歌者,忘了自己是演员。后来,他们又在平壤牡丹峰的露天广场演出。所有的演员里面穿着行头,外面披着棉大衣,坐在戏箱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等候自己的出场。那一个晚上,连演七出戏。他们依次是:袁金凯的《乾坤圈》,李玉茹的《小放牛》,黄元庆的《狮子楼》,周信芳的《追韩信》,程砚秋的《刺汤》,马连良的《借东风》,梅兰芳的《贵妃醉

酒》。后来,梅兰芳曾把这次演出的几张剧照,送给父亲。照片的质量不大好,但父亲一直保存到“文革”。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要求参加“赴朝慰问”的马连良,没有能懂得这一任务光荣伟大的意义,竟要求每场1070万元(旧币,折今1070元)的报酬。

在“讨价还价”中,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慰问最可爱的志愿军。”于是,他和剧团答应每场减70万元(旧币,折今70元)。

又有人再次提醒他说:“别的剧团只收演出费。”于是,他和剧团决定每场再减50万元(旧币,折今50元)。

吃戏饭的就得靠戏吃饭——马连良是按照梨园夙习、戏班规矩行事。是呀,即使给皇上唱,那也得“赏”下来,而且“赏”得不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哪里晓得中国眼下的惟一规则是革命——无条件地献身革命。

“你给最可爱的人演出还要钱?!”这一下,引起了震怒和众怒:上边认为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对正义的亵渎,是对革命的反动。文化部做了类似反革命行为的结论,并写入他的档案。

风风雨雨

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中,人们进入了1957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曲艺界的曹宝禄和京剧演员李万春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意见。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鸣放很快变成了反右。北京京剧团在上级的布置下,召开了批判李万春的大会。马连良不仅必须出席,而且必须讲话。他把牙关咬紧,鼓足勇气,上了台。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可讲了两句,就没词儿了。

散会后,马连良悄悄拉住李万春进了鸿宾楼饭庄。上了菜,马连良不好意思地开了口:“万春呀,希望你不要记恨我。不是我要批判你,是他们要我批判你。我是没辙。我听说这回内定的右派本来不是你,是我。后来听说上边没批,才改了你。可是,不管是你还是我,谁也不敢反党不是?”

马连良自以为这顿饭吃得谁也不知道。其实,上边早派了人盯着。很快,领导找马连良谈话,他受到严厉申斥。

1964年,京剧进入大演现代戏的时期。北京京剧团紧锣密鼓地排练《芦荡火种》、《杜鹃山》。现代戏的排练和演出都是在强烈的政治挂帅气氛里进行的,官方对于艺术的要求等同于革命的要求,故必须快捷、迅猛、干净、彻底地进行一场京剧革命。而这个改造和革命,令马连良想不到的是,它居然首先来自演艺界内部、来自舞台建制的拆解和戏班传统人际关系的崩溃。这一切,深深刺激着像马连良这样的一批老派艺人。打从这个时候起,马连良就觉得闷气,憋气。偶然的场合里,他终于爆发了。

6月27日上午,天气炎热,骄阳似火。北京京剧团在前门大街的广和剧场排练《杜鹃山》。戏里有个不怎么重要的角色叫杜小山,是由谭孝曾(谭门之后)扮演。排练时决定给这个人物新增加的一段唱腔,不唱了。

马连良问谭孝曾:“怎么不唱了?你是词儿不熟?还是腔儿不熟?”

谭孝曾答:“是腔儿不熟。”

马连良当即找来《杜鹃山》的唱腔设计李慕良,说:“腔儿不熟,你给他说说,还是让他唱吧。”

因为忙于准备排练,又由于导演已决定不唱,李慕良便说:“不用唱了。”

此言一出,马连良勃然大怒,道:“李慕良,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哪一位呀,也敢来驳我?”

全体愕然,鸦雀无声。在这样的气势下,马连良难抑多日来、多月来、甚至是多年来的闷气、憋气、怨气和怒气,决非逞一时之快的他又喊道:“我马连良不是一天半天的,你拍拍良心想想,我把你养活了。怎么?《芦荡火种》演好了!(李慕良是该剧音乐设计),你就全对啦?对你的骄傲,我耳朵里都装满了,不信你问问乐队。现在,你到家里连师娘(即马连良夫人)都不叫,你太难了。谁给你撑腰哪!敢对我这样,周总理见我都客客气气的。”这是一般人绝对不会说的,也绝对不会对一般人说的话。

排练暂停、终止。

回到家中,马连良发现自己手和腿都在哆嗦。个性不光是造就了马连良的台风,还是他的力量源泉。他自觉不自觉都在保护自己的个性。你很难改变他。况且,他是个有名望的艺人。

“马连良骂人问题”,以口头

和书面两种方式快速反映上去。上边也迅速做出决定,指示剧团党组织要对“职业是艺人、身份是国家干部”的马连良进行“开会批评”。

剧团党支部按照上级要求,对马连良的检讨做出了书面汇报与总结。他们有三点估计。其中第三点是,从揭发材料来看,马连良对现代戏是反对的,骂李慕良不过是指桑骂槐而已,问题的实质是对领导不满。这一点是最致命的。它预示着马连良不祥的未来。

艰难岁月

1966年6月4日。北京京剧团在一所学校演出现代戏《年年有余》。马连良化好装后,一般都要“衣——”“啊——”地吊吊嗓子。这次,他不吊了。却连喊了两三声“完啦!”后来才知道: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京剧《海瑞上疏》(由周信芳主演)是大毒草的批判文章。马连良知道这个消息,联想到自己主演的京剧《海瑞罢官》,预感到厄运的来临。果然第二天上午,北京京剧团就有人在中和剧场给马连良贴出大字报。6月4日的演出,从此成为绝响。

夏季,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

抢。马连良的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砸碎在地。刹那之间,以传统文化材料构筑的、既过于精神性也过于物质性的安乐世界,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赶来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

独不见了人。

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着马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四下里窺摸,可连被子也找不到一条。所长顺手扯下一副墨绿色丝绒窗帘,给马连良盖上。什么时候都能有一副闲自在样子的马连良,再也没有了自在闲定。

牛棚里的马连良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的。赵荣琛尚未被隔离,还可以请假外出。一日,马连良看见赵荣琛迎面走来,而四周恰巧无人。他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明白这个手势的含义,便趁外出活动的机会,买了几盒“前门”烟,偷偷塞给马连良。马连良一再道谢。看着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赵荣琛心里一阵发凉。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红卫兵“西纠”(西城纠察队)总部。

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

“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

数度惊魂,早已心力交瘁。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栖。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玥(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可谓天覆地载,孑然一身。一天,马连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马连良与卓别林及夫人马莲·高黛



梅兰芳和妻子福芝芳

梅兰芳和他的两个妻子

梅兰芳娶的第一位妻子叫王明华，与他可谓门当户对，她出生于一个京剧家庭，父亲王顺福工花旦，胞兄王毓楼，是著名的武生。王明华刚嫁过来时，梅家还不富裕，她毫无嫌贫之意，而是尽心尽力操持家务。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大永；隔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儿子女儿都很乖巧。那时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家，总是与媳妇儿说起演出的情况，与儿女嬉戏，沉醉在天伦之乐中。

王明华不仅在生活上体贴照料梅兰芳，甚至于在他的事业上也能给他很多有益的建议。为了长伴在梅兰芳身边，王明华在与梅兰芳生了一双儿女之后，一时考虑不周，贸然做了绝育手术，却不料过后大永和五十两个孩子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而相继夭折了。从此，梅兰芳每晚散戏回家，再也听不见两个孩子欢快的笑声，心中的伤痛是难以言表的，但他看到妻

子因怀念儿女形容憔悴不思饮食，整日里卧床叹息萎靡不振，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掩盖起自己的悲伤，反过来安慰妻子。夫妻俩就是这样互相安慰着支撑着度过了那些悲苦的日子。

梅兰芳的第二个妻子名福芝芳。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父亲去世很早，与母亲相依为命。福母福苏思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当她听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便道：我家虽然贫寒，但我女儿不做姨太太。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再至福家禀报：说明梅兰芳是兼祧两房，福芝芳入门后，梅家将把她与前边那位太太等同看待，不分大小。如此一番周折，福母这才允诺了这门亲事。1921年冬，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秦晋之好。

王明华原知梅兰芳对梅家香火所负责任，只是深悔自己当时的冒失及叹息命运的作弄，并不反对梅兰芳与福芝芳的婚事，更是没有

对梅兰芳有怨怼。她也知道梅兰芳是有情有义之人，不会嫌弃她，因此对福芝芳也很友善，两人相处得颇为融洽。细心的梅兰芳很是洞察王明华的复杂心理，为不使她难过，新婚之夜，他先在王明华的房里陪着说了些话，而后说：“你歇着，我过去了。”王明华本就是通情达理的人，又见梅兰芳如此体察她的心情，自然很是感激，便道：“你快去吧，别让人等着。”

福芝芳对王明华很尊重，当她生下大儿子后，立即提议过继给王明华，还亲自把儿子抱给王明华。王明华给婴儿缝了顶小帽子，又将孩子送回给福芝芳，她对福芝芳说：“我身体不好，还请妹妹多费心，照顾好梅家后代。”王明华因肺病久治不愈，身体很弱。后来为养病，她独自去了天津，最终病逝于天津。当福芝芳得悉后，叫儿子赴津迎回其灵柩，将她葬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

(摘自《现代家庭报》)

大劫难逃

冬天来了。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

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

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

饭碗都扔了出去。据说马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

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遽然长逝。

去世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让自己的儿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房探视马夫人陈慧珪。当听说马夫人吃住条件都很差的时候，便

立即请她搬到新帘子胡同的梅宅，与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载。陈慧珪来的时候衣服单薄，第二天福芝芳就打开柜子，找出衣料和棉花，特地为她做了一身新棉裤、新棉袄。后马夫人病逝。马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福芝芳毅然将马连良和原配夫人及陈慧珪三人，合葬于梅家墓地——万华山青松林下。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绚烂光泽与激情的生命，归于寂灭。

(摘自《中国青年报》)